

全球非传统安全观察

2023年6月下旬刊
总第65期

中国非传统安全论坛秘书处
圣皮耶国际安全中心



编者语

本期杂志致力于探讨新出现的非传统安全问题 (NTS) 及其对全球稳定的影响。我们的专家团队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和分析以为您提供全面的见解。我们的文章和采访揭露了重要且紧迫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以及应对这些挑战所采取的创新方法。

一本名为《危险时代：在新超级大国、新武器和新威胁的时代保护美国安全》的新书已经出版。它认为，即使在“9·11”袭击之后，恐怖主义从来都不是一种存在的威胁。即使基地组织 (al-Qaeda) 处在其最强大的时期，但它也从未真正威胁到美国的存在。然而，美国对反恐事务却过度关注，发动了两场所谓的“永无休止的战争”。相比之下，气候变化才是生存威胁。然而，我们对此问题的回应缺乏明确的方向和决心。

在纽约举行的第三次高级别会议上，各会员国的反恐机构负责人对此进行了讨论。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恐怖主义影响着世界上每个角落。它利用了地方和国家的脆弱性，以及政治、经济和安全系统的不稳定性。贫困、不平等和社会对个人或群体的孤立助长了恐怖主义；洗钱、非法采矿以及武器、毒品、古董和人口贩运等犯罪活动则为其提供了资金支持。

在印度召开的二十国集团农业部长会议上，英国食品和农村事务大臣泰雷兹·科菲 (Thérèse Coffey) 重申了英国通过可持续农业改善全球粮食安全的承诺。她在会上呼吁各国齐心协力，利用大自然的力量，为现在和未来的人们提供充足的食物。

欧盟议会通过了关于粮食安全的决议，以在 COVID-19 大流

行、俄乌战争和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加强欧盟粮食安全、农业自主性和复原力。决议决定欧盟必须减少对第三国的依赖，并使关键农产品的进口供应多样化。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代表杰里米·道格拉斯 (Jeremy Douglas) 表示，泰国、缅甸和老挝交界的金三角地区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贩运走廊之一。这个地区是将包括毒品在内的非法物品贩运到东南亚这一利润丰厚的市场的交通枢纽。

感谢您加入我们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重要探索，我们鼓励您积极参与对这本杂志中的多元观点的讨论。

让我们共同在 21 世纪不断变化的安全环境中航行。

2023 年 6 月 30 日
圣皮耶国际安全中心
刊物编辑部

目录

01 /

前沿研究 FRONTIER RESEARCH 11

重新审视大规模欧洲怀疑主义：分配正义的作用 11

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孤儿面临三重考验：战争、COVID-19 以及非政府组织财务危机 12

02 /

学者访谈 SCHOLARS INTERVIEW 13

William Moseley: 理解冲突中的全球粮食安全以及对分散系统的需求 13

03 /

研究员专栏 RESEARCH COLUMN 16

黄建钢：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论述的本质特性 16

学术委员会



余潇枫

主席

非传统安全理论专家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魏志江

委员

非传统安全理论专家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导
《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报告》主编
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



冯长根

委员

科技安全专家
中国科协原副主席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利兹大学物理化学系博士



余翔

委员

知识产权专家
欧洲科学院院士
华中科技大学二级教授、博导
湖北师范大学副校长
管理学博士



徐晓林

委员

非传统安全治理专家
湖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原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共管理学科评议组专家



黄建钢

委员

海洋安全专家
浙江省社科二级教授
浙海大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研究中心
(CZZC) 首席专家
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



陈斌

委员

中国非传统安全论坛秘书长
圣皮耶国际安全中心主任
广东印太和平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

顾问团队



Ritu Agarwal
经济安全专家
尼赫鲁大学国际研究院东亚研究中心副教授
德里大学政治科学系博士



Keven E. Bermudez
国际人道主义救援专家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顾问、“好邻居”组织创始人
医学博士



高剑波
信息安全专家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部教授、博导
UCLA 电子信息工程博士



胡靖
粮食安全专家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三农”与城镇化研究所所长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



Mohd. Aminul Karim
区域安全合作专家
孟加拉国独立大学商学院教授
国际政治科学协会会员
印度达卡大学博士



刘国柱
非传统安全理论专家
浙江大学世界史所教授、博导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
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



Yannis A. Phillis
产业安全专家
克里特科技大学校长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动态系统控制博士



谌新民
人口安全专家
华南师范大学经管学院教授
广东省人民政府省长决策顾问专家
暨南大学经济学博士



成锡忠
海外利益保护专家
西南政法大学非传统安全研究所特聘教授
北京中安华盾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常务顾问
西南民族大学国家民委东南亚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Chris Hadley
社会安全专家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管理专业博士



何一平
经济安全专家
广东国际经济协会原执行会长
广东省政协经济委原副主任
广东省广业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



李晓峰
经济安全专家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贸学院教授
博士与博士后导师
复旦大学博士后



林坚
文化安全专家
人大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社会系统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



Filippus Proedrou
能源安全专家
南威尔士大学研究员
色雷斯民主大学能源学博士



Jeffrey Reeves
文化安全专家
加拿大亚太基金会副总裁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专业博士



Syed Hussain Shaheed Soherwordi
恐怖主义问题专家
白沙瓦大学国际关系系主任，教授
爱丁堡大学博士



Kate Tulenko
公共卫生安全专家
Corvus 医学咨询公司首席执行官兼创始人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医学博士



Johannes Urpelainen
能源安全专家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SAIS 教授
密歇根大学政治学博士



Vlado Vivoda
能源安全专家
昆士兰大学可持续矿产研究院研究员
弗林德斯大学国际关系博士



余乃忠
《全球非传统安全观察》特约编辑
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



于铁军
国际安全理论专家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学系主任，教授
北京大学国际安全与和平研究中心主任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专业博士



姚羽
网络安全专家
东北大学教授，博导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会评专家
国家 863 高科技计划会评专家
东北大学计算机学院博士



张金生
贸易安全专家
深圳市世贸组织事务中心原主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级研究员
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



赵英
产业安全专家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原主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周树伟
社会安全专家
广东国际经济协会高端智库专家
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
广东省商务厅原副巡视员



朱新光
社会安全专家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
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博士

研究员团队



艾尚乐
金融安全研究员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
暨南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程永林
金融安全高级研究员
广外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
复旦大学金融学博士后



樊守政
恐怖主义问题高级研究员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教授
南京大学法学博士



侯颖
社会安全研究员
暨南大学博士后
澳门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



晋继勇
公共卫生安全高级研究员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教授、副院长、博导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博士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



Ilan Kelman
风险与减灾研究员
剑桥大学哲学博士
伦敦大学风险与减灾研究所教授



李佳
文化安全研究员
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
副教授
浙江大学管理学博士



陈永品
非传统安全治理研究员
广州开发区人才工作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国科学院环境科学博士



陈玉梅
网络安全高级研究员
电子高级工程师
暨南大学政务大数据开放与社会创新创业
研究中心主任、博导
澳门科技大学管理学博士



侯建雄
海外利益保护特聘研究员
广东国际经济协会常务副会长
广东世能电力设备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广东省重大行政决策咨询论证专家



黄永弟
“一带一路”非传统安全风险研究员
广东金融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广东金融学院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治理研
究所所长



Irfan Ullah Khan
人口安全研究员
浙江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硕士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管理专业博士候选人



李方芳
全球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员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全球健康外交顾问
阿姆斯特丹大学和巴塞罗那国际健康研
究所双博士



李乾
海洋安全助理研究员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候选人



廖丹子
非传统安全理论高级研究员
浙江省数字安防与非传统安全研究院特邀研究员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管理专业博士



刘凤元
金融安全高级研究员
华东政法大学资本市场研究中心主任
国际金融法律学院教授



刘金山
经济安全高级研究员
暨南大学投资咨询（研究）中心主任
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



刘天阳
非传统安全治理研究员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研究员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哲学博士



刘元玲
气候安全高级研究员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美国经济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



卢矜灵
东南亚地区安全研究员
广西民族大学东盟学院越南语信息员



麦方
财政安全高级研究员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



Bakirov Maksatbek
中亚地区安全研究员
吉尔吉斯奥什国立大学硕士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管理专业博士



莫有恒
海洋安全助理研究员
武汉大学国际法学博士候选人



覃胜勇
公共卫生安全高级研究员
中山大学医学国际合作办公室主任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



Imran Ali Sandano
非传统安全理论研究员
巴基斯坦信德大学国际关系学助理教授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管理专业博士



Luis L. Schenoni
拉美安全研究特邀研究员
伦敦大学学院安全研究助理教授
圣母大学政治学博士



汤取安
海外利益保护特聘研究员
中城卫保安集团原国际部副总经理
国际注册信息系统安全专家（CISSP）
中国国家注册高级保卫师



Diana Toimbek
非传统安全理论研究员
哈萨克斯坦国际研究实验室高级专家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管理专业博士



王彥兴

社会安全研究员
广东省惠州市府办政策研究员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



王新和

北极问题高级研究员
青岛市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



王卓

社会安全高级研究员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中国西部反贫困研究中心主任
西南财经大学法学博士



谢法浩

社会安全研究员
暨南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



谢贵平

边疆安全治理高级研究员
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
浙江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导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管理专业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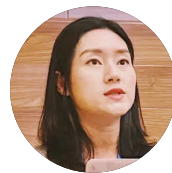
许涛

中亚地区安全高级研究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亚研究室主任
研究员、博导
莫斯科国立大学博士



张建华

贸易安全助理研究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贸学院博士生



章雅荻

移民治理方向研究员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讲师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管理专业博士



赵欣

海外利益保护特聘研究员
广东信良兆诚律师事务所主任
广东法学律师研究会副会长



郑先武

区域合作安全高级研究员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史博士



周龙

人口安全研究员
广外国际关系学院外交系主任，副教授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



周木亮

经济安全高级研究员
广州商务局国际招商处处长



钟晓君

经济安全研究员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财经学院商务系主任，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



周燕萍

贸易安全助理研究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贸学院博士生



周章贵

资源安全高级研究员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水资源安全研究所所长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管理专业博士



邹冠炀

公共卫生安全高级研究员
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
英国爱丁堡玛格丽特女王大学博士

1 前沿研究

重新审视大规模欧洲怀疑主义：分配正义的作用

Baute, S

欧盟一直致力于提高社会公正性和权利保护，但未能完全解决分配正义问题。欧洲怀疑主义在多层次治理架构中不断兴起，可能与欧盟治理结构中的结构性缺陷有关。为了更好地了解大众欧洲怀疑主义的社会根源，该文章对以下问题进行研究：对分配不公正的看法与公民中的欧洲怀疑情绪有何关系？腐败在多大程度上缓和了分配正义观念与欧洲怀疑主义之间的关系？

首先，作者提出了三个假设：对收入不公正的看法与欧洲怀疑主义呈正相关；对机会不公正的看法与欧洲怀疑主义呈正相关；在腐败程度较低的国家，欧洲怀疑主义与结果分配不公正和机会分配不公正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强。

然后，作者通过对来自 2018 年欧洲社会调查的数据进行多层次建模，以探究欧洲怀疑论与分配不公正之间的关系，并判断这种关系是否可以被宏观变量所解释。研究包括了多个变量，包括个人变量和宏观变量。个人变量包括收入的分配不公正看法、个人机会的分配不公正看法、欧洲怀疑论的程度以及一些个人的社会结构特征。宏观变量包括腐败程度、人均

GDP、收入不平等程度以及社会支出占 GDP 的百分比。所有连续变量都经过标准化处理，以便进行比较。数据结果表明，收入、教育、就业机会不公正的人更容易持欧洲怀疑主义观点，而感知到的分配不公正对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更具有影响力。此外，研究还发现，腐败与分配不公正之间存在积极而显著的相互作用。然而，这种相互作用效应在涉及到机会分配不公时并不明显。

最后，作者得出结论，当公民认为机会和结果对自己的处境更加不公平时，他们持有更强烈的欧洲怀疑态度，而不是他们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这种基于正义的欧洲怀疑主义更有可能发生在腐败程度较低的国家。这些发现为以往对欧洲怀疑主义根源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补充和证据，并为未来的研究提出了两个主要路径：探索公民评估社会资源分配方式对欧盟普遍合法性的影响，以及分配正义与欧洲怀疑主义之间的动态关系。

来源：

Baute, S. (2023). *Mass Euroscepticism revisited: The role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European Union Politics*, 0(0). <https://doi.org/10.1177/14651165231170789>

编译：梁海瑶

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孤儿面临三重考验： 战争、COVID-19 以及非政府组织财务危机

Abu-Ras W, Ashraf AbuLaban A, Talat AlQaisi S, AlQaisi MTH, Decker E

本文讨论了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孤儿在战争、COVID-19 和非政府组织（NGO）的财务危机下所面临的问题。由于战争频繁爆发和 COVID-19 的大流行，孤儿们的生活已经受到严重影响。除了这些问题以外，NGO 在经济上也面临困难，NGO 不得不调整项目以确保能够继续为孤儿们提供服务。基于此，作者提出了研究问题：了解金融危机如何影响非政府组织为叙利亚和伊拉克孤儿提供的服务；确定危机对孤儿的社会、经济、健康和福祉的影响。

作者首先采用了半结构化访谈的方法对 8 名来自伊拉克、11 名来自叙利亚的参与者进行访谈，以探究金融危机和 COVID-19 对叙利亚和伊拉克孤儿的影响，以及对非政府组织的服务提供的影响。其次，作者采用了修正的基础理论方法（M-GTA）来进行数据分析，使用开放编码和选择性编码对数据进行分类，以扩大主题范围。

随后，研究结果表明，COVID-19 不仅使难民面临健康问题，还对当地和国际非政府组

织造成冲击。孤儿家庭和为他们服务的非政府组织的健康、教育、经济和社会状况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这些数据总共产生了七个重要的概念，每个概念都是相互关联的：不断恶化的经济状况，不断恶化的教育水平，身体健康风险，损害孤儿及其母亲的心理健康，童工增加，暴力事件的增加，以及行为问题。

最后，作者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建议，认为需要在政策和实践层面上采取全面的方法，并提供广泛的服务和支持。家庭和社会工作者需要接受培训。还需要提供正规的教育课程和培训，因为教育对于孤儿的成长和发展至关重要，同时也需要关注儿童的心理压力和家庭支持。非政府组织和其工作人员以及各级政府机构应紧密合作，加强资源投入和政策配套，以帮助这些弱势儿童。

来源：

Abu-Ras W, Ashraf AbuLaban A, Talat AlQaisi S, AlQaisi MTH, Decker E. Orphans in Syria and Iraq Juggling Balls: Wars, COVID-19, and the NGO's financial crisis. *Int J Qual Stud Health Well-being*. 2023 Dec;18(1):2170010. doi: 10.1080/17482631.2023.2170010. PMID: 36744740; PMCID: PMC9904298.

编译：梁海瑶

William Moseley: 理解冲突中的全球粮食安全以及对 分散系统的需求

俄乌冲突持续影响着世界各国的经济以及资源安全，在 Dr.Moseley 与其他学者共同撰写的文章《乌克兰军事冲突对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影响》中，他提到了一系列由军事冲突引发的问题，包括全球贸易的巨大混乱、食品价格的提高和波动等等。由于这场冲突尚未结束，SPCIS 采访到了 Dr.Moseley，向他提问关于这场冲突的持续是否会继续使全球贸易、食品价格和整体的粮食安全蒙上阴影；同时，询问他对当前的人道主义危机达成全球协调的政策响应的看法以及建议。

感谢您询问我共同撰写的《乌克兰军事冲突对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影响》（高级专家粮食安全和营养小组，HLPE-FSN，的政策简报）的更新信息。在此我以个人身份回应，而非作为 HLPE-FSN 指

导委员会的成员。

如今的食品价格情况比乌克兰战争开始时要好，当时全球食品价格在 2022 年 2 月至 3 月间达到了历史最高点。更具体地说，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食品价格指数在 2023 年 5 月平均为 124.3 点，比前一个月下降了 2.6%，比 2022 年 3 月的历史最高点下降了 22.1%。尽管价格已经下降，但仍高于 2020 年和 2021 年第一季度的价格。高昂的全球食品价格，与冲突和恶劣的天气条件一起，加剧了全球粮食不安全的状况。据世界粮食计划署(WFP)统计，目前世界上约有 3.45 亿人面临严重的食物不安全问题。与 2022 年的 2.58 亿人，2021 年的 1.93 亿人以及 2018 年（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的 1.13 亿人相比，如今情况日趋严重。

全球粮食系统就像一艘庞

大的海洋船只，需要时间来调整航向。乌克兰战争，加上与新冠疫情相关的供应链中断，确实开始引发关于建立一个不依赖于贸易和少数全球主要粮仓的全球粮食系统的讨论。因此，许多国家的政府正在提高国内的粮食生产的优先级，价格敏感的消费者也在调整他们的饮食，因为进口的谷物变

特邀学者



威廉·莫斯利是一名人类环境和发展地理学家，教授的课程包括：人类地理学入门；人类、农业和环境；非洲；发展和欠发展；以及环境和发展研究高级研讨会。他的研究兴趣是政治生态学、热带农业、环境和发展政策以及生计安全。其大部分实地工作都是在西非和南部非洲进行的。他在过去几年的研究分为三个大类：1) 分析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和当地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或政治生态学）；2) 生计安全、饥荒预警和饥饿；以及3) 现代和传统农业的环境层面。他在国际发展领域也有十年的实践经验，曾在英国救助儿童会、世界银行环境部、美国国际开发署和美国和平队等组织担任项目经理和政策分析员。这些实地的政策和项目经验为他的研究和教学提供了很多参考。由于他对现实世界的政策感兴趣，所以他的爱好之一是为大众媒体写专栏文章。

得越来越贵。例如，随着小麦粉价格上涨，许多西非城市的面包消费量有所下降。

虽然全球粮食系统正在开始改变，但大部分仍然保持不变。有趣的是，俄罗斯已经成为乌克兰粮食出口下降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去年乌克兰的小麦出口下降了37%）。在2022-2023年，俄罗斯创下了4300万吨小麦出口的纪录。与此同时，随着乌克兰的出口减少，世界的其他地区，即北美和南美，也在增加出口。然而，最受乌克兰战争重创的仍然是那些最依赖其粮食出口的国家，即中东，北非和非洲之角的几个国家。此外，由此产生的价格上涨对最贫穷的人群影响最大。

目前，国际社会对于如何应对全球粮食危机无从下手，原因有两个。首先，当前的部分粮食危机与乌克兰战争有关。因此，任何试图解决黑海地区粮食出口问题的尝试，如黑海粮食协议及其后续续约的谈判，都会被高度政治化，并被视为一方对抗另一方。这种对战争的紧张也在其他国际论

坛中得到体现，往往使得关于短期内解决粮食危机的讨论陷入瘫痪。

另一个导致瘫痪的重要原因更多的是对于如何在这次粮食危机之后最好地前进的哲学分歧。一方面，许多主要的粮食出口国和传统的粮食安全思想家希望在危机后回归到原状，也就是一个基于少数几个主要粮食生产国使用能源密集型农业方法并将剩余产量出口到世界各地的全球粮食系统。另一方面，一些国家和行动者认为当前的全球粮食系统将近瓦解，而且极度脆弱（由于前述结构）以至于对各种冲击都非常敏感，如：能源价格飙升，与疫情相关的供应链中断，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日益不稳定的天气模式，以及在主要粮食生产区的战争和冲突。对于这第二个群体来说，我们需要的是——一类更分散的粮食系统，有更多的本地和区域粮食生产，使用更少的能源密集型农业方法。

实际上，当世界上出现广泛的粮食不安全时，没有人会获胜，因为这将导致社会动荡、

人口迁移和人类的痛苦。虽然乌克兰的战争超出了粮食安全学者、政策制定者和活动家的视野，但我和其他人对于第二次分歧（上文所述）有明确的观点，即回归现状还是推动更分散的粮食系统。我倾向于后者，反对回归现状，因为每次世界面临粮食安全危机时，都

会加倍依赖生产农业和贸易。我们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第一次绿色革命（对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的农业贸易焦点，以及最近 2007-2022 年的非洲新绿色革命中都看到了这一点。鉴于生产农业未能解决饥饿问题，以及全球粮食

系统的日益脆弱，我们是时候尝试一种不同的方法，强调生态农业生产方法、领土市场和强大的社会保障网。

接触：方耀苑

提问：鲁鑫照

定稿：巢未



黄建钢：
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论述的
本质特性

一、强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海洋论述的终极目标

这是解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思想并从中提炼而出的一个本质特性。十八大报告提出“海洋强国”，它是中国“强国”三大方案之一，其它两个“强国方案”是“文化强国”和“人才强国”。但到十九大时，报告已经形成一个系统的内容丰富的包含12个子方案的“强国”总方案。由此可见，“海洋强国”是中国最早的“强国”方案。其中，在十七大报告中，只有一个“人才强国”概念，当时时兴的还是一个“兴国”概念。中国共产党十六大和十七大

形成“发展是执政兴国第一要务”概念，为此形成“三个代表重要论述”和“科学发展观”的“兴国”理念和理论，认为“兴国之要”在于，搞好经济建设。十九大报告揭示，中国共产党已经进入一个“执政强国”状态。从“兴国”到“强国”是一个历史的跨越。关键是，“海洋强”还不是最终目标，至多是一个阶段性目标，“国家强”才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海洋论述的根本目标。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富”并不等于“强”，“富

起来”还只是一个数量概念，“富起来”才是一个质量概念，从“富”到“强”不是简单的量变结果，而是一种质变的结果。一般“国富”指的都是“国民富”，如英国人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只是郭大力、王亚南把它翻成了《国富论》而误以为是一个“国家富”的概念。只有“国强”才是一个“国家强”的概念。

21世纪是海洋时代，更赋予了“海洋强国”特殊的历史使

命。在12个子“强国方案”中，几乎所有的子“强国方案”也都可以“在海洋强国”中找到落脚点而得以体现。这是十九大报告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启示。11个子“强国方案”与“海洋强国”子方案可结合发展成“海洋人才强国”、“海洋制造强国”、“海洋科技强国”、“海洋质量强国”、“海洋航天强国”、“海洋网络强国”、“海洋交通强国”、“海洋贸易强国”、“海洋文化强国”、“海洋体育强国”、“海洋教育强国”等等一系列且连续的子方

研究员介绍



黄建钢，圣皮耶国际安全中心学术委员，海洋安全专家，浙江省社科二级教授，浙海大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研究中心，（CZZC）首席专家，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

2019年4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重要命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的重要论述是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有特色、最重要、最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发展，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所创立的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的重要论述，不仅体现了“治国理政”思想，也体现了“治球理海”思想，有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和本质特性。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海洋论述的“本质特性”主要由如下六方面组成从而形成一个互为渗透、互为支撑和相互影响的体系。

案。其中，除了“海洋航天强国”还难以或者不好理解外，其它的结合几乎是一目了然的。“强国”是一切工作、一切子方案和这个总方案的目标，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一直在追逐的“中国梦”。

二、海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海洋论述的主要“路径”

这是解读习近平总书记“一带一路”论述，特别是“一路”论述并从中提炼出的一个本质特性。仔细研究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包含12个子方案在内的总的“强国方案”就会发现，只有“海洋强国”方案是一个物理的综合方案。这与人类的发展状态密切相关。人类发展到现在已经经历两个阶段，一是陆权时代，一是陆权和海权相间相容的过渡时代。现在随着人类对大宗商品需求的大幅增加，随着人类对海洋休闲业和旅游业需求的几何级数式增长，“海路”逐渐成为人类联系和发展的主要路径，也就成为中国发展的主要“强国之路”。

在中国，第一次明确把“海洋定位于强国之路”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的“730”论述中，他指出，“我国既是陆地大国，也是海洋大国，拥有广泛的海洋战略利益。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海洋事业总体上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这些成就为我们建设海洋强国打下了坚实基础。我们要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陆海统筹，坚持走依海富国、以海强国、人海和谐、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通过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方式，扎实推进海洋强国建设。”

从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读出这样几个要点：一是我们要建设一个“海洋上强的”国家。这个提法对应的是“海洋上霸的”国家。其中，“海洋霸”是一个单面的海上军事实力的概念，“海洋强”是一个综合实力的概念。二是我们建设“海洋强国”的思维是“坚持陆海统筹”。三是我们建设“海洋强国”要走的是一条“依海富国、以海强国、人海和谐、合作共赢”的道路。四是

我们建设“海洋强国”必须“通过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方式”推进。其中既有目标，又有思维，还有道路，更有方式。

所以，一定要重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海洋强国”论述中的这个“海路”思想。这方面思想在2017年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习近平总书记有很好和很精准的阐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聚焦发展这个根本性问题，释放各国发展潜力，实现经济大融合、发展大联动、成果大共享”。但由于地球陆地面积和海洋面积相差巨大，所以“一路”比“一带”要丰富得多，发展的空间也要大得多。同时，走海洋之路，人类的能源消耗也最少，地球环境保护得也就更好，地球生态才会更好。

三、经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海洋论述的全面布局

“经略海洋”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的“730”会议上提出的一个与海洋有关的谋略概念。习总书记说：“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要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推动我国海洋强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唯一一个与海洋谋略有关的概念。据不完全研究，习近平总书记至今没有“海洋战略”的表述。

从谋略范围看，“经略”对应的是“战略”“策略”和“方略”，但在海洋问题上，“战略”和“方略”还只是一个思维概念，尚未到达措施层次。“经略海洋”不仅是“关心海洋、认识海洋”发展的一个结果，也是“海洋战略”“海洋方略”深化的一个产物。然后，再在此基础上形成“海洋策略”。其中，“海洋战略”虽然还没有一个完整的表达，但它既是一个“战略定力”思维看“海洋”的结果，也是一个“基本方略”思维看“海洋”的结果。而“战略定力”是十八届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的一个“主题”。“基本方略”是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与“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一起要求全党“全面贯彻”的。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思维中，海洋本身只是一个路径概念和方式方法概念，还不是一个目

标概念和终端概念。这可以从习近平总书记“730”论述中讲到的“依海富国，以海强国”中得以感悟。

一是怎么发展海洋。习近平总书记认为，“要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着力推动海洋经济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发达的海洋经济是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支撑。要提高海洋开发能力，扩大海洋开发领域，让海洋经济成为新的增长点。要加强海洋产业规划和指导，优化海洋产业结构，提高海洋经济增长质量，培育壮大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提高海洋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努力使海洋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由此形成了“海洋发展力”。

二是怎么保护海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着力推动海洋开发方式向循环利用型转变。要下决心采取措施，全力遏制海洋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趋势，让我国海洋生态环境有一个明显改观，让人民群众吃上绿色、安全、放心的海产品，享受到碧海蓝天、洁净沙滩。要把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海洋开发总

布局之中，坚持开发和保护并重、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并举，科学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维护海洋自然再生产能力。要从源头上有效控制陆源污染物入海排放，加快建立海洋生态补偿和生态损害赔偿制度，开展海洋修复工程，推进海洋自然保护区建设。”由此形成了“海洋保护力”。

三是怎么支撑海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展海洋科学技术，着力推动海洋科技向创新引领型转变。建设海洋强国必须大力发展海洋高新技术。要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努力突破制约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生态保护的科技瓶颈。要搞好海洋科技创新总体规划，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重点在深水、绿色、安全的海洋高技术领域取得突破。尤其要推进海洋经济转型过程中急需的核心技术和关键共性技术的研究开发。由此形成了海洋支撑力”。

四是怎么维护海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着力推动海洋维权向统筹兼顾型转变。我们爱好和平，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但决不能放弃正当权益，更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要统筹维稳和维权两个大局，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相统一，维护海洋权益和提升综合国力相匹配。要坚持用和平方式、谈判方式解决争端，努力维护和平稳定。要做好应对各种复杂局面的准备，提高海洋维权能力，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要坚持“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推进互利友好合作，寻求和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由此形成了“海洋维护力”。

四、和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海洋论述的根本方式

和平海洋，这也是在2013年“730”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的。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和平”已经从一个状态概念飞跃至一个方式概念。

习近平总书记在“730”论述中指出，“建设海洋强国”，我们必须通过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方式，扎实推进”。这也是他“海权”思想的核心和灵魂。

其中，他又特别注重“海洋三权”中的“海洋权益”。这既超越了马汉的“海洋权力”思想，又超越了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海洋权利”理念。其中的关键是，要把一种“权利和平”发展为“权益和平”。只有把“权利”上升到一个“权益”层次，海洋和平才能真正来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论述中，至今几乎还没有一个“海洋权利”的表达。因为中国既没有对外扩张霸权以谋取利益的传统，也没有与人争权夺利的习俗。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我们有权维护正当的海洋权益”，“中国致力于和平解决同邻国的海洋权益争端”。

在2014年的“119”会议即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演讲说，“大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需要大智慧。亚太发展前景取决于今天的决断和行动。我们有责任为本地区人民创造和实现亚太梦想。这个梦想，就是坚持亚太大家庭精神和命运共同体意识，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共同致力于亚太繁荣进步；就

是继续引领世界发展大势，为人类福祉作出更大贡献；就是让经济更有活力，贸易更加自由，投资更加便利，道路更加通畅，人与人交往更加密切；就是让人民过上更加安宁富足的生活，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

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亚太应该成为这样，一是“要共同建设互信、包容、合作、共赢的亚太伙伴关系”，二是“要携手打造开放型亚太经济格局”，三是“要不断发掘经济增长新动力”，四是“要精心勾画全方同时，应该从中文的概念内涵中体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海洋论述中“和平”的本质特性。仔细琢磨就会发现，中文的“和平”比英文的“peace”在内涵上更丰富、更深邃。peace 原则上是一个“非战争”、“不要战争”的意思，而中文的“和平”海洋包含：不战海洋、不争海洋、开放海洋、平等海洋、和气海洋、平和即心平气和的海洋、包容海洋、合作海洋、制度海洋、发展海洋、共赢海洋等等。其中，不战和不争思维又是海洋“和平”本质特性的基

础。而“不争思维”又是老子《道德经》中一个重要思维。老子在《道德经》中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夫惟不争，古天下莫能与之争。在 21 世纪的海洋时代中，典型的水思维就是海洋思维。海洋是水的主要、最后和代表性的形态。不争思维，不仅是一种“不战争思维”，还是一种“不斗争思维”和“不竞争思维”，它更是注重和发展一种“合作思维”和“协作思维”，再达到一种“和谐思维”，并且在“和谐”的基础上再创造一个共赢状态。

五、公共：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海洋论述的最高境界

这是解读习近平总书记“人类命运共同体”论述并从中提炼而出的一个本质特性。公共海洋，是 2015 年 9 月在联合国成立 70 周年系列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局论述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中隐含的一个重要理念。因为 21 世纪是一个海洋时代，“海洋”也就自然成为了一个物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海洋不仅是习近平总书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载体，也是人类真实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注重海洋生态。没有了生机盎然的海洋，人类也将趋于灭亡。海洋生态还关系人类的食物安全。其中，“共同体”的英文是 community。而 commune 就是 community 的核心词，是“公共性”。这是一种超越了“共同性”的“公共性”。在英文语境中，只有 public 和 common 才是“共同性”，但“公共性”是另一个单词 commune。其中，把 Republic 翻译为“共和国”就是一个重要例证。“共同性”的另一个单词是“common”，但不是单词“commune”，它们十分相似且高度相同。共同体 community 是共同性 common 的基础，虽然从发展的程序来看是先有“共同性”common 后才有“共同体”community 的，但现实的“共同性”common 只有在“共同体”community 中才能持久地依存和发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南非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上提出的“共同发展”就是 common development。它引

起了国际政界、学界和媒界的高度重视，也是一个例证。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最高执政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文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注重英文的“community”，其实既是历史重任，也是历史趋势。世界潮流正在以 commune 在逐渐地取代 public 和 common。经过研究，这是一种“共同性”被“公共性”逐渐所取代的一个过程。由此看出，“commune”即“公共性”就不仅是一个政治概念，它还是一个社会运行和生活方式的概念。只是在关于海洋的论述中，习近平总书记才把这种“公共性”最后落实在了“海洋”里，形成了“海洋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

不仅保护海洋人人有责，而且海洋利益也是人人有份。“利益 = 利 + 益”。其中，凡“利”者，都是“私利”的，凡“益”者，都是“公益”的。但现实是，人们至今只是对“共同体”有认识，而对“公共性”甚至还没有感觉。这是我们把“community”翻译成“共同体”的一个认知原因。

一定要看到，由“命运共同体”带来的“新经济”本身就是一种崭新的新公共经济、新工业经济、新科技经济、新海洋经济。“公共性”将导致“公益性”，“公益性”又将导致“权益性”的充分发展。

所以，在2016年9月G20峰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呼吁要树立一种“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2017年1月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习近平总书记在万国宫出席“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2017年2月，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日前协商一致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首次写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在2017年1月17日、18日，在瑞士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连续发表两场主旨演讲，先后提出“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中国主张和“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的中国方案。“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从中可以看出，在这个“命运共同体”中，“和平”“发展”“文明”“担当”是共同的主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行动”。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国际社会要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作出努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些国家提出要各自为政，就是要以维护本国利益为优先，而把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放在脑后。”由此说明，妨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是各国自身的利益。习近平总书记“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被联合国接受，说明人类需要一种新公共经济即 The Economy of Community。而海洋经济就是最大的“新公共经济”即 The New Economy of Community。其中，海洋是人类最大的物理“命运共同体”。

六、包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海洋论述的增长方式

这是解读习近平总书记“包容性增长”论述并从中提炼而出的一个本质特性。包容海洋，这是“增长”发展到现在的——一个世界性难题。以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为标志，中国的海洋事业特别是海洋经济进入了一个“包容性增长”阶段和态势。

“包容性增长”的英文概念虽然是由亚洲开发银行在2007年提出的，但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论述中的“包容性”是另一个概念。中文的“包容性”比英文的“包容性”既深刻又丰富。中文的“包容”=包+容，但英文的“包容性”(inclusive)是只有“包”而没有“容”的，“容”的英文应该是dissolve。它前面有一个resolve的过程。无论是dissolve还是resolve都是solve的具体延伸和展开，它们是解决问题的两种方式和两个阶段：resolve是分解，而

dissolve是溶解。只有溶解了，才是最终解决了问题。何况，在“包容性增长”中，不仅有“包容”，更有“增长”，而且还是一种“包容式的增长”。

现在，中国推动全球“治球理海”的方式是“包容性增长”。其中，最大的“包容性增长”载体就是“一带一路”。由于海洋占全球表面积的71%，所以“一路”在其中更具有全球性。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的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已经不仅把“包容性增长”理念融进了“一带一路”特别是“一路”的“倡议”中，而且也使其内涵由比较简单的“机会平等的增长”发展成为了一个丰富立体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并且认为“这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其实，世上的最大包容性在海洋，最大的包容性增长在海洋经济。古语“海纳百川”很好地体现了这个思想。其中，包容是创新的基础。包容=包+容。它们既是两个阶段，又是两个层次，还是两种状态，更是两种作用。溶解为一体，不分彼此是“包容”

的最后和最终目的。其实，“容”还是一个综合过程。中国的“海上之路”发展路径一要靠“舟山江海联运服务中心”来嫁接，二要靠“一路”来包容世界各地、各国文化、各种势力。并要在文化包容的基础上再创新时代的海洋文明。文明不仅是对文化的发展，更是对文化共识的构筑。

中国是最早接受、提倡和落实“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国家之一。在国务院批复的《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发展规划》中已经明确了“舟山群岛新区”在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增长极”地位。中国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应该在世界的“包容性增长”方面有所创新、突破和展开。在2017年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一，我们要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我们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各国应该尊重彼此主权、尊严、领土完整，尊重彼此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第二，我们要将“一

带一路”建成繁荣之路。第三，我们要将“一带一路”建成开放之路。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贸易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我们要有“向外看”的胸怀，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自由贸易区建设，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第四，我们要将“一带一路”建成创新之路。创新是推动发展的重要力量。“一带一路”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创举，搞好“一带一路”建设也要向创新要动力。第五，

我们要将“一带一路”建成文明之路。“一带一路”建设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

这些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论述的本质特性。它们既是古为今用的结果，又是洋为中用的产物。中国的海洋事业特别需要关于海洋论述的本质特性，还需要对本质特性的

活学活用。这种“活学活用”用现在的话语体系说，就是需要创新。而“本质特性”既是思想的“初心”，又是思想的重心，更是思想的核心。所以，一定要“不忘初心”。我们利用、开发和发展海洋并成为事业的初心，就是为了使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它既为了“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也为了全世界的“人类增长”。

编辑：尹金灿



编辑团队



王星懿
执行主编



梁海瑶
研究助理



许汶
研究助理



尹金灿
研究助理



杨佳琦
校对编辑

《全球非传统安全观察》

本刊由中国非传统安全论坛秘书处、圣皮耶国际安全中心联合出版，旨在跟踪观察非传统安全议题下的社会资讯、政策动向和学界研究，为从事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工作人员与研究人员提供时新、长久的信息渠道。

本出版物内容版权属于圣皮耶国际安全中心。转载、摘编请注明“来自圣皮耶国际安全中心”。如因作品内容和版权问题需要同圣皮耶国际安全中心联系者，请于 30 日内进行。



中国非传统安全论坛秘书处
圣皮耶国际安全中心

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 326 号亚洲国际
大酒店 1803 室

联系电话：
020-83870795